

#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卢汉超/著 段炼 吴敏 子羽/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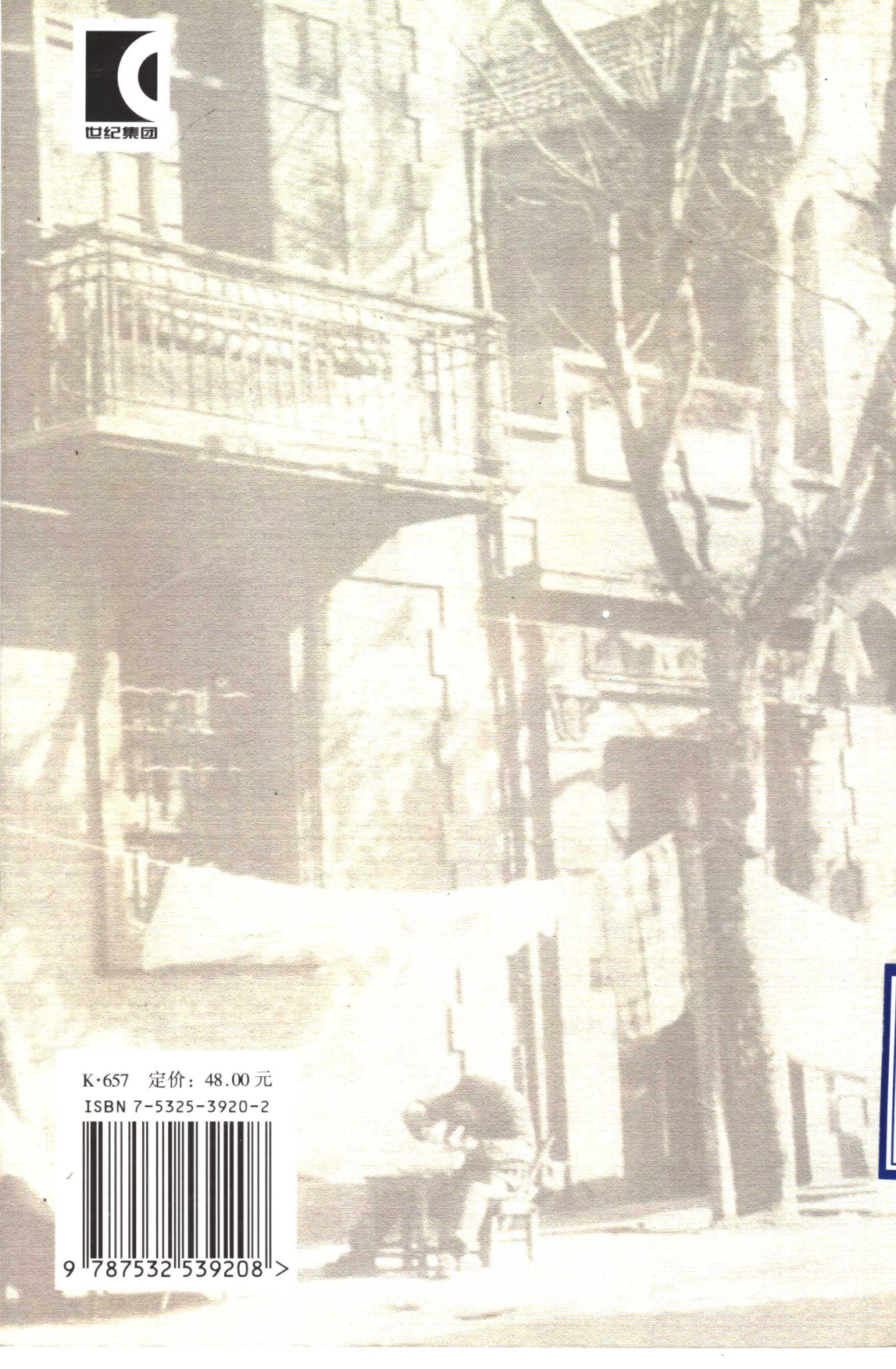


世纪集团

K·657 定价：48.00 元  
ISBN 7-5325-3920-2



9 787532 539208 >



#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卢汉超

story

译

社

#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卢汉超著；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920-2

I. 霓... II. ①卢...②段...③吴...④子...

III. 社会生活-史料-上海市-20世纪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399 号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199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本书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卢汉超 著

段炼 吴敏 子羽 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12 1/16 印张 19  $\frac{14}{18}$  插页 5 字数 366,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25-3920-2

K·657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 × 813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吕 健

美术编辑：黄 琛

技术编辑：富 强

## 海外有关《霓红灯外》一书的评论

美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这是关于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

美国有关中国学研究最集中的学术评论刊物《国际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这是一本辉煌的著作。它在创造和追溯时空上超凡脱俗。此书再怎么样被隆重推荐也不为过——这不仅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上海,甚至不仅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中国,而是因为它为写作地方史创造了一个典范。”

美国地理学界主要刊物《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每一页都令人爱不释手。”

加拿大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加拿大历史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我们对二十世纪上海——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的了解因为这本书而更加丰富了。”

英国中国研究的最主要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一部扎扎实实的精彩著作。”

美国跨学科的《选择》(Choice)杂志的书评将此书列为“所有图书馆的必备之作”。

此书于2001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两年一度颁布的最佳著作奖。这是此大奖第一次颁布给华裔学者,也是该学会历史上仅有的三本有关中国的获奖著作之一。

**为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 目 录

导论.....	1
城乡关系：一体化还是断层？ .....	3
城市和近代化：商业文明的构建 .....	6
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中心论”？ .....	13

## 第一部 寻求都市梦

第一章 到上海去 .....	21
从种族隔离到各族混居 .....	22
来自五湖四海 .....	29
鱼龙混杂 .....	43
第二章 人力车世界 .....	62
人力车 .....	62
人力车夫 .....	67
车夫生存状况的另一面 .....	73

## 第二部 立锥之地

第三章 逃离棚户区.....	103
万国建筑博览会.....	104
棚户区.....	108
棚户区居民.....	116

进厂就业：棚户区的梦想·····	119
第四章 小市民之家·····	131
现代房地产市场的兴起·····	131
里弄的变革·····	135
二房东·····	148
石库门大杂烩·····	154
第三部 上海屋檐下	
第五章 石库门后·····	174
唤醒城市的人们·····	174
商贩·····	181
邻里之间·····	196
第六章 石库门外·····	223
客堂间里的商业贸易·····	223
小菜场·····	243
街区购物·····	249
政治干预·····	257
结论·····	272
过去·····	274
西方·····	283
共产主义者·····	289
附录 1 一项对于上海居民背景的调查·····	299
附录 2 被采访者情况列表·····	306
参考文献·····	310
译后记·····	345

## 导 论

近年来,上海近现代史越来越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出版的各类有关上海的学术著作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上海城市史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上海开埠前的状况到上海城市的国际化,从清代的道台衙门到会审公廨,从传统的行帮到现代的企业家协会,从公共卫生到高等教育,从巡捕房的建立到黑社会组织,从工人罢工到学生运动,从同乡会到社会歧视,从知识分子的类别到妓女的等级诸如此类的问题。<sup>①</sup>就像任何高质量的区域性研究一样,已发表的上海史研究著述所关注的都是超越上海城市本身的大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绩。

对于海外学者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对上海史的研究与上海本地学者几乎是同步的。1978年起,传统的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上海的研究人员努力延续了解放前著名学者柳亚子(1886—1958)先生所领导的上海通志馆的工作。<sup>②</sup>在这一形势下,上海研究已超越了以往的领域,已不再是简单的地方志类的编辑物了。上海史研究材料种类繁多,有专题历史资料、档案史料、回忆录、掌故轶事和老照片,还有一大批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sup>③</sup>更重要的是,上海研究已成为国际性东方学中的一门显学。尽管在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和相互理解等方面海内外学者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上海史研究这一领域内的中外学术交流是近年来最活跃的学术交流之一。<sup>④</sup>

然而,在生动丰富的上海史研究长廊中,对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

述显然还不够。如果说人类历史的首要因素是人，而影响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因素包括人在哪里居住和劳动，那么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本书的意图就是描绘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一般居民区内每日的活动。

上海这个繁华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它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虽然在大部分年份上海的外籍人士还不到3%，他们却来自世界各地，从流浪汉、妓女到外交家和暴发户，应有尽有。上海的中国人从某种观念而言也是外来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是乡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上海，希望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些移民可分为两部分：小市民（他们被这样称呼）和城市贫民。四分之三的城市住房是一种简单的建筑样式——里弄房子。从1880年起的一个多世纪里，这儿是普通市民（即小市民）的住所。仔细观察这片极具特色的生活区域，这儿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来自乡下——他们在市中心或次中心区域的生活状况，这就是本书的主题。像小市民一样，城市贫民也几乎全部来自乡下，在城市的贫民窟内生老病死，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的经历显示出了传统风俗、习惯的巨大影响力，这些“昔日的农民”，逐渐融入了城市，适应了城市全新的、现代化的、西化的市民生活方式。作为关注的焦点，我注重描述上海城市里的小人物——至少在精英人物的眼中他们显得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而精英人物的生活则非本书的重点。

随着我的研究逐步展开，三个主要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本书的研究是地域性的，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与整个中国有关。当研究结束之际，这些问题已成了本书的理论框架，而本书的素材也围绕着这些问题铺陈展开，并测验一些理论问题的正确性。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征：当中国人迅速地抛弃那种认为城市是乏味或危险的老思想，开始有了城市优越于农村的观念，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否真的如此近代化、如此成熟和西化了？上海是否成了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异类？上海的商业文化是如何使局外者形成了对上海感到陌生而格格不入的概念？从这个问题又引申出了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上海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上海人有社区认同的概念的话，是否这概念来自大家同住在那些拥挤的居民区？最后，作为关于近代化和认同感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要讨论如何恰当地运用西

方的观念去了解中国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问题。

## 城乡关系：一体化还是断层？

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者为了中国传统城乡关系与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之间的显著差异而争论不休。就欧洲而言，城市犹如被文化落后的乡村所包围的“海中孤岛”。而中国的城市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与周边的乡村是合而为一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他的同事们在其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联为一体的。直至十九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尤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和鲜明的对照。甚至连作为城乡分界标志的城墙，也无法将城市和乡村隔绝开来。<sup>⑤</sup>

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结果，西方文化中常有的城市优势感在传统中国并不盛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的精英阶层多为拥有土地的士绅。他们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于乡村，而不在城市中心。虽然一些精英阶层居住在城里，也有许多人由于工作的原因背井离乡，但他们都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乡村他们保留着正式的住宅和“恒产”，即祖业(例如土地)，建造家族的墓地和祠堂。总之，他们的根仍在乡村，本身仍属于乡村。<sup>⑥</sup>同样，中国人的文化并不能以城乡为界而分成截然不同的或特征对立的两个部分。中国的城市不像欧洲那样是文化的独占区和宗教的中心。中国的文化与宗教场所星罗棋布，并不限于城乡之间的分界线，因此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比村镇更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当然也有例外，例如首都)。中国的城市也不像欧洲的城市那样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市政纪念建筑物以及“市民”的概念，而使其能区别于周围的乡村。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之间保持着各种联系，人口双向流动，这使得城乡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难以产生城市优越感。<sup>⑦</sup>

事实上，人们还会发现一种与之相反的倾向：传统的中国城市常常有着一种消极的形象。在宋代以前(960—1279)，中国城市是占据优势的行政中心，不可避免地联系着衙门、赋税、徭役、刑罚、诉讼。它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成了让人敬畏的所在，至少让乡下人敬畏。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商业化特征并没有使乡下人头脑中的城市形象得以改善提高。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商人的恶名声和固执的社会偏见反而增强了人们对城市的恐惧。这里有着衙门:这是利用各种手段迫使人屈服的场所。伊懋可(Mark Elvin)曾提到:“城市是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害怕的地方。一位清朝的官吏写道:‘乡下人害怕去县城,他们像害怕老虎那样害怕官员。’城市是上税交租的地方,是诉讼打官司的地方。城市又是各种罪犯云集之地。比如‘市场恶霸’,他们就是欺骗乡下人的行家里手。而在饥荒之际,城市又是卖儿鬻女的所在。”<sup>⑧</sup>

不仅仅是农民(当然,他们在人口中是占压倒多数的),而且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城市是罪恶的。在由一小群学者型的精英官员治理着的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的国度里,知足地在乡村中生活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形态。中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以一些六七十岁的老者一辈子没去过城市作为社会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象征。<sup>⑨</sup>这种思想似乎一脉相承。对此,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评论道:“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sup>⑩</sup>这是关于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简单明了的陈述和概括。

在二十世纪,古老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尽管对城市的种种疑虑在某种程度上仍挥之不去,但人们已开始认为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比乡村市镇要好。这一全面的重新评价主要来源于城市中经济机遇的显现。在二十世纪,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工业化并行,促进了城乡的分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渐渐被城乡断层所取代。这一切发生于二十世纪动乱中的中国,顾炎武也许不得不苦笑,因为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要尝试彻底了解城乡断层的深度,就必须面对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勉强度日、悲惨生活这一不争的事实。由于贫穷,他们无法享受一个现代化城市所提供的大部分便利,不得不容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所有的艰难和伤害没能迫使他们离开城市。恰恰相反,他们尽可能地将家庭成员从乡村接往城市。

在民国成立之后的上海,有两种城市贫民最能反映出城市的吸引力:黄包车夫和街头乞丐。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人数众多。在老舍先生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主人公是一位贫困的农民,他经不住城市的诱惑,于1920年来到北京。在那里,他以拉车为生:“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

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对于老舍的这段话，戴维·斯特朗(David Strand)评论道：“由于城乡之间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即使是‘低收入’的职业，例如黄包车夫，也能使农民满足，而成为他们期望过上更好生活的目标。”<sup>⑩</sup>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近 100,000 名黄包车夫，他们为了 25,000 辆出租的黄包车而竞争着。如果以每辆车日夜两个班次来计算，总共有 50,000 个职位提供给车夫。因此，一个车夫每月 15 到 16 个班次的工作量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另外，还有数千人被雇为私人包车夫。

在黄包车夫这支队伍中，绝大多数是直接从周边地区贫困乡村来城市寻找机遇的农民。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无法在家乡继续生存下去了。那里天灾肆虐，盗匪猖獗，战乱频仍。他们来到城市，勉强度日。对于他们而言，这样的迁移并不是寻求更好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城市里或许还有发财的良机，这才是城市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之中，能活下去的幸存者被认为是成功的。用一句中国流行的俗语来形容：“好死不如赖活着。”

另外还有一支由从前的农民所构成的贫民队伍，他们有充足的经验来适应城市的生活，这些人就是乞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大约有 20,000 到 25,000 名职业行乞者。像黄包车夫一样，这一贫民群体中大部分也是来自农村的难民。在三百六十行中，乞丐是最低贱的职业。对此，中国有一句俗语：“除死无大难，讨饭再不穷。”<sup>⑪</sup>

然而，一项关于上海乞丐世界的研究显示，乞丐生活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社会地位低下和无能者的职业，或者说个人生活失败者的穷途末路。在民国之际的上海，乞丐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职业，并不是每个新手都能轻易从事的。从乡村迁来城市的移民，有时更愿意过乞丐生活，这意味着某种特权。一句中国的俗语使乞讨具有了戏剧性：“讨了三年饭，当官也不干。”<sup>⑫</sup>这样的事情有时确实发生了。广州的一名乞丐曾拒绝他姐夫的举荐，不愿去当一名县官。“宁与五百罗汉(即他的乞丐伙伴)作伴，不为五斗米折腰。”<sup>⑬</sup>乞丐生活由于充满神秘、讲究策略，而且高度组织化，在近代中国的城市中成了一项具有吸引力的可自由选择的“行当”。

城市的贫困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产物，更是农村危机的结果。黄包车夫和乞丐这两项最低下的城市职业(黄包车夫们被形象地比作“牛马走”；乞丐则往往与死亡悲惨地联系在一起)的吸引力进一步显示了近代中国城乡



差异的加剧。二十世纪城市的贫困根本上是农村不景气的结果，城市似乎给了贫困绝望的农民一线希望，人们在此勉强谋生，就像溺水之际所抓住的救命稻草。

全盛之际的上海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城市。在饥荒之年，警察局和慈善机构不得不收殓成千具的尸骨。大部分死者是从农村新来城市的，还有那些是被遗弃的可怜的婴幼儿。<sup>⑨</sup>或许有人会说，这样一个城市根本不是穷人的天堂。它当然不是天堂。但与死于街头者和处在战乱饥荒中的受害者相比，上海那些穷困的幸存者——其中车夫和乞丐是最典型的——显然是属于幸运的。

城市优越论被视为“西方文明中的陈词滥调”，并不适合于中国社会传统。<sup>⑩</sup>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一西方的陈词滥调明显地引发了中国人的想像力。为了求生而依附于城市的乡下人无疑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际的和朴素的材料。这也表明了城市优势论并非进口的，而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产物和普通百姓生活经验的概括。经济上的机遇、日常生活上的便利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赐予城市相对于农村无法比拟和难以抗拒的有利条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集中并增强了城市生活的吸引力，有这么一句自夸之辞：“走尽天边，好不过黄浦两边。”<sup>⑪</sup>上海优势论的观念也明显地体现在一首嘲笑乡下小姑娘虚荣心的民谣中：

乡下娘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像。学来稍有瞎相像，上海已经换花样。<sup>⑫</sup>

在这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对天真的乡下女孩的嘲笑，更是对农村落后状况的嘲讽。

## 城市和近代化：商业文明的构建

虽然城市原先的消极形象已慢慢淡化，但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当城市看上去像一处比农村更适宜居住之处的時候，许多人（不仅仅是农民和居住于农村的乡绅）仍然痛恨城市，认为城市是无理性的、危险的。到了二十世纪，对于城市的看法不再单一，已成为充满矛盾的混合物，赞美、羡慕、恐惧、鄙视交织在了一起。虽然人们对于城市的情感不断趋于肯定，但对城市的畏惧情绪却一直延续到了革命之后。